

自本刊8月、10月兩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刊出「經濟民主·政治民主與中國」的主題討論以來，受到廣泛關注，讀者反映強烈，有彈有讚。另外，大陸畫家和美術教育工作者還有來信，說到今年幾期關於當代藝術危機的文章給他們以啟發。這一切，都令編者欣慰。

——編者

是「第二次解放」， 還是「倒退」

前幾日收到《二十一世紀》第24期，讀了崔之元的文章，感到並無新意。就大體而言，其思路、觀點等均與國內在1978-1983年介紹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捷克的奧塔·錫克，或東德約翰·巴羅乃至布哈林的某些觀點、「瓦爾加遺言」的觀點類似。在當時，這些觀點對批判斯大林式社會主義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現在，崔文並不是「第二次解放」，而是「倒退」。

崔文還談到延安「選舉」，當時完全是給「國統區」看的。時至今日，即使大城市的區級選舉仍是兒戲一般，遑論當年延安軍事化的「選舉」。我們幾位朋友議論，有些大陸留學生和學者根本沒有去過農村、工廠，甚至沒有在國內任何機關單位工作過。現在是「在飛機上了解中國」，所以寫的東西不切實際，只是根據報紙、書本（以毛澤東的幾句話）來談農村、來作比附。

雨臣 北京

94.9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恢復「社會主義即民主」 這一命題的本意

8月號所刊崔之元與昂格的兩篇論文是有的放矢、實事求是的研究。作為一個生活在中國社會深處的本土知識份子，在對那些習以西方流行概念模式附會、套用於中國的海外宏論屢屢失望之後，我對崔文的中肯分析與理論創意深感讚嘆與共鳴。

崔文把「利益」概念不僅作為事實描述，而且作為價值判斷（儘管後一點在崔文中未作展開）的一個基點凸出來了。這是當今海內外學界在討論當代中國問題時有意淡化了的。大量論文與調查報告把轉型期中國只視作民族或地緣政治的國家實體對象，所謂整體的中國富強已成為今日大陸民族主義以及國家主義諸新意識形態的基點。90年代以來蔓延開的新國學熱（那與作為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獨立意識的80年代文化討論熱在性質上有很重要區別），其弊害一面亦源於此。然而，在「中國現代化」或「中華騰飛」口號下，諸階層財富權力再分配的這一歷史性變動被隱瞞了。但是，離開社會公正的「現代化」是甚麼「現代

化」？實際上，崔文關於政治官僚與經濟精英勾結的警告，以及強勢政府不等於威權主義的強調，也正與此點有關。

因此，崔文關於社會主義的重新闡釋有重要意義。對於處在又路口的今日中國而言，一種既放棄斯大林式專制社會主義又拒絕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弊病的選擇，不可能無視中國社會主義歷史與現狀基礎。當然，這種重新闡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同意編者的按語，是超越了傳統觀念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分對立的。但是，恢復「社會主義即民主」這一命題本義，在今日卻有其現實意義。

曉林 西安

94.9.10

對我的創作有鮮活的刺激

讀完司徒立與金觀濤的「藝術與哲學的對話」的12封信，我便帶學生去黃山和周圍的老城寫生去了。一個月後再讀仍興味不減。我逐字逐句的讀，很多地方引起思索和共鳴。我想這12封信將對我今後的創作有着鮮活的刺激。我將在繪畫中看看我對「理解即創造」的理解，看看我是否已開

始了「新主題畫」的創作實踐？
畫家 上海
94.10.12

讀藝術通信，帶勁！

回到家來，首先看「藝術與哲學的對話」，一讀上手就放不下來。金觀濤的「藝術活動的主體性」觀念，以前聞所未聞，其「參與意識」和「超越意識」的提法有說服力。但細細反思，又覺得似乎人類在所有社會行為活動中都具有這兩個本質的方面。金在談「繪畫公共性的喪失，是人類社會大轉型中的一種特殊現象」的同時，指出：現代社會中，藝術家在於發現新的人類。而司徒立卻每每發出對於公共性喪失的否定、批判的誘示。讀這種文章，帶勁！

讀者 杭州
94.10

探索美術發展的方向

《二十一世紀》是我在海外閱讀到的中文書刊中最喜愛的一份刊物。作為一個畫家，我更多關注的是藝術方面的討論。司徒立與金觀濤有關藝術方面的哲學通信，具有很強的探索精神，對西方美術發展方向提出獨到的見解。希望作者能繼續有關探索。

李進宇 加拿大
94.11.15

望貴刊保持其思想性及風格

十分感謝貴刊幾年來一直贈閱刊物，《二十一世紀》以其

思想性、文化性和世界性獨領風騷，使我們能及時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些學術動態和信息。如某些專題討論極富好評：文明衝突、國家能力、民族主義與中國，以及最近關於當代藝術的討論。往往是刊物一到，人即索之而來，誰都希望先睹為快。所以，希望貴刊能繼續保持自己的思想定位和刊物風格。

讀者 南京
94.10

閒話學界行規

拙文在貴刊登出後(總24期)，國內外有不少朋友來信提及。流離海外，最大的痛苦是沒有共同的刺激。很高興《二十一世紀》成為海內外聯繫的紐帶。

最近在海外華文刊物上(不是《二十一世紀》)讀到幾篇很精彩的文字，作者視野之寬、剖解之深，令人欽佩。只是個別部分似曾相識。仔細一想，原來是我本人發表過的觀點，甚至措詞都類同。

稍舉二例：

某作者：「將異常的性行為給反動階級以便淋漓盡致地描寫」。(鄙人原句：「酣暢淋漓地寫異族之禽獸行，更有安全距離。»)又云：「《苦菜花》中女三青團員被國軍輪姦，反諷地同時成為那幾年裏青少年性啟蒙和性恐嚇的教材」。(鄙人原句：「《苦菜花》等『壞人帶黃』的革命小說，是50年代少年的政治教科書兼性啟蒙讀物。」)

另一作者：「知識份子不是在既成主流體制中的操控

者，而是所在既定體制的反思者、質疑者，乃至批判者，他們的位置就是在既定主流體制的邊緣觀察、省視、批評。」(鄙人原話不抄了，見《走向邊緣》，《讀書》，94年1期，頁34)。

這兩位作者都是學界重鎮，我至今十分敬重。理應為尊者諱。我想說的只是：學界的職業行規，借用別人的意見時應加註。這點在大陸無人理睬，想不到海外竟然也不受西方學院教育影響，可見中國「文統」延續性之強。

或許這兩位先生讀閒書不做卡片筆記，看過文章以後留下印象，想不起出處。但他們這兩篇文字註釋極多。第二位在引余英時的觀點時註明出處。緊接着逐字引了我的文字，甚至加了引號，冒頭卻說「正如有些論者所指出的」。

唯一的解釋是海外學者另有行規，註釋分等：古人名人洋人，可資根據；同輩同道，可助聲威；不夠份兒如鄙人，省點篇幅算了。說實話，處處加註也太費事，但連續多處一條不註，甚至直引也不註，恐怕就是有意省略了。

我自己不小心時也漏註，曾因此鬧出誤會，何能苛責於人？這封通信，只是向學界同仁求教行規問題。

趙毅衡 倫敦
94.10.17